

七日談

（北京篇）

晨起，隔窗觀望，但見室外一片蕭瑟，樹枝上的冰霜在晨光中閃着逼人的寒光，唯玉蘭枝頭拱出的毛茸茸花蕾顯得格外乍眼。這奇異景色昭示，時下雖值寒冬臘月，但冬與春的轉換卻在悄然有序地醞釀中。二者的交接處，似乎並沒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蘊藏的僅是極致的嚴寒與溫和的萌動彼此交鋒、纏繞與妥協，以緩慢的角力，最終達成季節輪替的動態平衡。這自然界的博弈，同人類社會極致與中庸對峙的境況竟然如出一轍。

極致如嚴冬，有着摧枯拉朽的絕對力量。當西伯利亞的寒流長驅直入，萬物在零度以下的嚴寒中呈現一種近乎透明的存在狀態：湖水凝成玻璃，落葉的脈絡在冰晶中纖毫畢現，連時間都彷彿被牢牢凍住。它鮮活地雕塑出大自然獨特的生態效應：不是這極致的寒冷，就不會有晶瑩雪花六角分明的奇跡；不經過這嚴酷的收斂與貯備，就不會有春日的萌發與新生。人類的精神亦如此，許多極致的追求往往成為文明躍升的推動器。比如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極致忠貞，為後人留下《離騷》的千古絕唱；哥白尼對日心說的極致堅持，撕裂了中世紀神學的黑暗帷幕；梵高筆下旋轉到近乎瘋狂的星空，成功地把色彩的組合推向了情感的高峰……這極致的追尋，為理想的最終實現開闢了無限可能。

然而，極致不是極端。純粹的極端常淪為偏執，讓事物失去應有的轉圜能力。自然與社會的法則就是這樣的微妙而深刻：隆冬若永駐，萬物終將窒息；烈焰若長燃，一切皆成灰燼。歷史上那些絕對的烏托邦神話，往往都以冰封或焚毀而告終。它們忘了，生命需要的是可飲的溫度，而非滾燙或刺骨。於是，受規律支配的「中庸」力量就會悄然登場，其手段不是簡單的折中調和，而是柔軟且堅定的干預與調整。類似冬春之交晝夜漸長的微妙變化，陽

光雖一日暖過一日，卻又不急於驅散所有寒意；土地會緩慢解凍，予萬物根系以逐漸伸展的過程。這種漸變式的轉化不是剛性的克服或取代，而是讓對方互相看到各自的存在，並在相互滲透與轉變中成全彼此。像《易經》陰陽魚圖所展示的那樣：陰中有陽眼、陽中有陰眼，萬物負陰而抱陽；也如孔子所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正是這種「恰到好處」的智慧，為中華文明塑造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審美品格，培育了「允執厥中」的政治智慧，形成了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

冬與春這種相生相成的自然轉換，恰似極致與中庸關係的極佳說明。因為沒有冬的極致澄澈，春的萌動便失了對比的張力；沒有春的中和轉化，冬的肅殺便成了永恆的沉寂。冰封是大地能量的積聚，解凍是萬物甦醒的儀式。極致似刀刃，劃破混沌；中庸若刀鞘，護其鋒芒。同理，沒有理想主義的極致燭照，中庸就會淪為庸俗的和稀泥；而沒有中庸的制約與調節，極致則可能演變為毀滅性的狂熱。只有在對抗中尋求動態的平衡，才能實現在尊重且保持差異的狀態下，達成更高層次上的和諧共生。《貞觀政要》中魏徵曾經規勸唐太宗，既要有「居安思危」的極致清醒，又要有「載舟覆舟」的平衡智慧；蘇軾一生遊走於儒釋道之間，才有了朝堂之高與江湖之遠的從容流轉，既能抒發「大江東去」的磅礴極致，也能吟唱「人間有味是清歡」的平淡灑脫，兩種精神氣質自然諧調地融在同一生命的節律中。歐洲文藝復興大師們的巨大成功，也是在極致的人文精神與古典的和諧法則之間，鎖定了跨時代文明創造的黃金點。所有這些，都屬於靈活運用對立統一法則的經典範例。

觀今日之世，自然生態破壞導致的氣候異常波動，猶如人類文明失衡的隱喻。當發展追

寒極與春萌

雲 德

求極致速度而失卻自然中和，消費主義走向極致而遺忘發展須持續之時，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被視為零和博弈，文化傳承與創新被看作對立選項，個體自由與社會責任被置於對峙兩端，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高科技的進化好像完全可以脫開社會倫理與人文精神的規約，這就把自然與社會運行的固有節律打得七零八落，給人類帶來諸多深層困境。究其根源，它們所普遍忽略的，恰是那些早被歷史反覆驗證過的基本常識，或許也是非此即彼思維定式作祟的結果。豈不知，持久的生態最需要多樣性的共存，深厚的文明必定是多重傳統的疊加，健康的自由永遠離不開相互關係中的自主獨立。

破除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並非主張立場模糊的相對主義，而是強調釐清世間萬物對立中蘊含統一的複雜現實。如同嚴寒的收斂為萌發蓄能，適度的暖意引導新生一樣的道理，冬寒與春暖從來不是對立的選項，而是同一生命過程的兩種表達，是時間琴弦上相鄰的兩個音符。現實生活中，人類同樣需要承襲其法則，

培育自己在堅持核心價值時保持開放態度、在捍衛原則立場時理解他者、在仰望星空時敬畏腳踏實地的認知能力。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春來方顯萬物之欣榮。真正的聰明，或許不是擇此棄彼，而在於懂得何時該極致如冬，以澄清玉宇；何時當中庸若春，以孕育新生。在由冬轉春的微妙時刻，我們眼見的不僅是自然的律動，更是兩種力量如何通過看似對抗的舞蹈，最終譜寫出生命的完整韻律——那是在冰封的極致中保存生機，又在萌動的中和裏開創新生的永恆輪迴。

玉蘭花蕾的萌生，讓我們看到了極致寒冬也無法阻擋春潮的如期而至，它似乎也在啟示我們：智慧的至高境界或許就藏在既能欣賞冰凌純粹剔透、也能等待溪流潺潺融通的包容當中。該凍結時，要讓思想如冰棱般銳利透明；該生長時，當讓生命如萌芽般柔軟兼容。只要悟透了其中的精義，人們就能在精神上容納看似矛盾的多面性，在時光的流轉中保全真正的自我，進而實現人生四季般的豐盈與完整。



◀ 1月7日清晨在北京拍攝的朝霞。 新華社

致敬經典



黛西札記
李夢

上海歌舞團的《永不消逝的電波》七年演了八百多場，腳步遍及國內外六十多座城市。前些日子在珠海跨年，好奇前往金灣藝術中心欣賞此作，看看這部常演常新的當代舞劇，究竟有何魅力。

舞劇以同名電影為創作靈感。電影自一九五八年首映以來，已成為數代人的集體回憶。孫道臨、袁霞飾演的隱秘戰線工作者夫婦李俠與蘭芬，王心剛等飾演的國民黨特務，皆入木三分，李俠在影片最末被捕前向戰友發出的最後電文「同志們，永別了！我想念你們！」更是那些年無數熱血男女為之潸然的經典片段。

時長兩個小時的舞劇，基本還原了電影的主要情節，並在原本敘事的基礎上宕開旁支，透過上半場的群舞《漁光曲》和下半場的旗袍舞等，描畫上世紀四十年代舊上海的市井風物。在《漁光曲》旋律的蕩漾中，十數位女舞者着長衫，手搖蒲扇，或生火煮飯，或洗衣，生動展現街坊的細瑣生活百態，與隱秘戰線的殘酷與極致的緊張形成鮮明反差。以擅長抒情的舞蹈語言講述隱秘戰線的複雜故事，難度極高，編創團隊既能在舞者不着一言的前提下順暢推進劇情，又能以主線與旁支互為唱和的方式令到敘事節奏張弛有度，將家國大義與兒女情長結合得恰到好處，尤為可貴。

與《只此青綠》和《詠春》等知名舞碼一樣，《永不消逝的電波》出自韓真和周莉亞兩位八〇後編導之手。《只此青綠》中驚艷觀者的「青綠腰」同樣出現在這部舞劇中，極富東方意蘊。不過此劇編排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兩位藝術家對於「時空」的再造和想像。講述李俠和蘭芬的日久生情時，主創在舞台上搭建了三個「景中景」，通過「主雙人舞」與三組「輔雙人舞」合力示呈兩人從相識到相愛的不同階段，場景間既相對獨立又彼此呼應；介紹男女主角執行任務時，巧妙將舞台分作左右兩側，一側是李俠在裁縫店中破解密碼，另一側是蘭芬識破假扮成黃包車夫的特務。這類時空並置疊合的場景，在劇中屢屢出現，不單豐富了舞作的敘事張力，亦增加了現代感，更符合年輕一代觀者的喜好。



▲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劇照。 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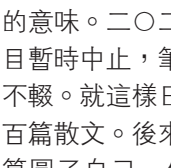


英倫漫話
江恒

對於二戰時期英國和澳洲之間「鴨嘴獸外交」的故事，很多人應不陌生，最新學術研究披露了有關這段歷史的更多細節。

時間回到一九四三年初，歐洲戰場形勢依然嚴峻，納粹德國海軍潛水艇在北大西洋游弋，英國也為戰爭疲於奔命。因此，當邱吉爾向澳洲政府發去電報，要求他們向英國運送六隻鴨嘴獸時，澳洲總理約翰·科廷感到十分詫異。要知道除了海上已遭德軍封鎖，鴨嘴獸本身也很難人工飼養，跨大洋運送好比天方夜譚，以至於澳洲動物園園主杜雷爾怒批這項計劃是「愚蠢至極」。

儘管後來有歷史學家試圖從地緣政治角度為邱吉爾開脫，但根據最新的學術研究認為，邱吉爾實際上並沒有深層考慮，他就是單純地想要得到活的鴨嘴獸。一方面，邱吉爾本人是個動物愛好者，他一生都在收集珍稀動物，包括黑天鵝、白袋鼠、一隻名叫托比的虎皮鸚鵡（他曾陪同邱吉爾參加部長級會議），以及一頭名叫羅塔的獅子（牠被放在倫敦動物園飼養）。另一方面，鴨嘴獸作為單孔目動物，與其他哺乳動物有很多不同之處，比如是卵生，且有着鴨嘴狀的喙、扁平的尾巴和部分蹼狀的腳，外形十分奇特，以至於許多早期研究鴨嘴獸的歐洲科學家都懷疑是偽造的。邱吉爾在此之前曾收到過一個鴨嘴獸標本，



人生在線
陳中威

說起這本書的誕生，其實有些「無心插柳」的意味。二〇二〇年，疫情讓滬港兩地的工作項目暫時中止，筆者卻意外地在文字的世界裏筆耕不輟。就這樣日復一日，三年時間裏竟積累了近百篇散文。後來從中挑選了七十篇集結出版，也算圓了自己一個少年時的出書夢。當世界陷入「停擺」，我們被迫直面生命的脆弱與存在的本質，筆者在那段時間裏堅持寫作，並非出於某種功利的目的，而是像考古學家般，在記憶的廢墟中尋找文明的碎片。每一篇散文都是對過往的一次精神「考古」，當自己將這些碎片拼接成《心必受之方為愛》時，忽然發現：真正的創作從來不是向外的征服，而是向內的覺醒。這段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人生往往就是這樣，看似最艱難的時刻，只要心裏揣着自信、堅持與盼望，壞事也能變成好事，最終結出甜美的果實。疫情帶來的停擺，反而成了自己與文字

鴨嘴獸外交

牠生前是第一隻在墨爾本被成功圈養的鴨嘴獸，讓邱吉爾愛不釋手。二戰期間，英軍在東南亞戰場進行的一系列偵察任務就被命名為「鴨嘴獸行動」，邱吉爾在指揮有關軍事行動時，該鴨嘴獸標本就擺放在他的辦公桌上。邱吉爾不滿足於標本，希望能得到活的。

很快澳洲政府把運送六隻鴨嘴獸的任務交給了澳洲「自然保護之父」、生物學家大衛·弗萊，卻遭到他的強烈反對，聲稱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震驚的事情」。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鴨嘴獸悖論》一書中透露了自己不理解的理由：「試想像，當歐亞大陸正陷於戰火、全人類飽受折磨之際，邱吉爾這樣一位肩負重任的人，竟然還有時間思考，甚至渴望擁有六隻鴨嘴獸，多麼荒唐！」他從生物學家角度指出，人工飼養鴨嘴獸十分困難，將多達六隻鴨嘴獸安全運到英國是不現實的，更何況在戰爭時期，實屬勞民傷財。在他的力勸之下，澳洲政府最終同意只運送一隻健康的雄性鴨嘴獸，弗萊給他取名為「溫斯頓」，與邱吉爾同名。

一九四三年九月，鴨嘴獸「溫斯頓」秘密登上了裝備精良的「菲利普港號」輪船，牠被安置在甲板下由弗萊建造的木製籠裏，船上還儲備了足夠牠環球航行所需的蚯蚓、小龍蝦、麵包蟲和淡水等。輪船悄悄駛離墨爾本，橫渡太平洋，穿過巴拿馬運河，進入大西洋，據航行日誌記載，鴨嘴獸一直「精神抖擻，胃口很好」。一份新聞稿也隨即發布，宣布「溫斯頓」即將抵達英國，

並請英國各地寄送蚯蚓，裝在「黴菌或潮濕茶葉」的罐子裏，用來餵養首相的新寵物。

悲劇在此時發生了。在將要抵達陸地的前兩天，船上的聲哨偵測到德國潛艇，船長隨即投下了深水炸彈，但德國潛艇沒有被摧毀，鴨嘴獸「溫斯頓」卻成了「受害者」，牠被嚴重的腦震盪殺死。弗萊後來在書中寫道：「劇烈的衝擊波當場奪去了鴨嘴獸的生命。這種擁有密集神經、極其靈敏的小動物，甚至能在漆黑的夜晚察覺到溪底蚊子幼蟲的細微動作，卻無法承受人類製造的巨大災難，比如劇烈的爆炸。」

不過，近年有澳洲學者研究認為，除了爆炸可能造成的痛苦，鴨嘴獸「溫斯頓」的食物來源不足，加上熱應激，也是導致牠死亡的因素。當時的航海日誌顯示，船上的蚯蚓大批死亡，當船隻穿越赤道水域時，氣溫飆升至攝氏三十度以上，水溫也超過攝氏二十七度，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一周，而鴨嘴獸在高於攝氏二十五度的環境中無法調節體溫，僅僅是熱應激就足以殺死牠。這些研究發現得到不少學界人士的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有歷史學者認為，與邱吉爾得到鴨嘴獸純屬個人愛好不同，當初澳洲政府之所以同意他的要求也摻雜着政治考量：「將鴨嘴獸送到倫敦的壯舉，不僅能為澳洲人贏得讚譽，對於那些身處戰亂的英國人來說，他們在倫敦動物園觀賞鴨嘴獸時，也會聯想起同樣面臨戰爭殘酷現實的澳洲同胞，可共同為大家鼓舞士氣。」但事實證明，這場「鴨嘴獸外交」以失敗告終。

二〇二六，願你成為更好的自己

深度對話的契機，這或許就是困境中蘊藏的禮物。

再說說書裏的內容，大致分為人物、年歲、運動、演藝等幾個類別。其中「人物」部分，我寫了不少家中祖輩的真人真事。去年恰逢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在整理這些故事時，先祖在抗戰時期的身影愈發清晰——作為一位民族資本家，他毅然自沉商船，以阻敵寇、報效國家。在抗戰的硝煙中，祖輩用捨家為國的擔當詮釋了什麼是「破產赴國難，有國始有家」。這讓我聯想到西西弗斯神話——明知巨石終將滾落，卻依然選擇推石上山。戰後家族四代人更為了另外兩艘商船，同日方進行歷經七十七年的國際訴訟，最終在二〇一四年劃上了句號。今天我們重讀這段歷史，不是為了沉溺於苦難敘事，而是要從歷史的傷口中提取照亮未來的火種。香港於戰後發展至今，它是無數先輩用熱血與汗水澆灌的成果。所以，我們更該珍惜眼前的和平，珍惜那些愛我們、支持我們的人，別讓他們的付出被辜負。

或許筆者的這段經歷能讓年輕人了解，漫步人生路上誰都難免遇到起起落落，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沮喪，甚至會陷入艱難困苦的黑暗時刻。但越是這樣，我們越不能對自己失去信心，更不能讓愛我們的人失望。只要心裏有光，有那份不熄滅的信心與盼望，就一定能挺過去，



▲2025年12月31日晚，觀眾在璀璨煙火中迎接新年的到來。 中新社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曾經有這樣一個關於夢想的悖論：當我們以為在追逐夢想時，實則是夢想在塑造我們。書中那些未能實現的理想、未能抵達的彼岸，構成了比成功更動人的歷練之詩，就像敦煌壁畫中的飛天，永遠保持着飛翔的姿態，卻從未真正抵達雲端。這種未完成性，恰恰是筆者認為人生中動人的註腳——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成長不是抵達終點，而是在追逐的過程中不斷蛻變。只要努力過、嘗試過，就沒什麼可遺憾的。畢竟，敢於出發、勇於堅持的本身，就已是一種收穫。二〇二六，願你一直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並成為更好的自己。